明清战争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

李 治 亭

明清之际，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大变动时期。这场大变动约始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以清肇兴于辽东、李自成奋起于西北为标志，打破明朝的一统天下，到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覆没，持续了近五十年，最终以清朝完全胜利、明朝彻底亡国、李自成等农民军退出历史舞台而结束。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清朝取明而代之，是得之于偶然，还是势所必然？本文尝试从明清战争的角度，对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作一简单分析，或许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

一、战争是明清交替的基本动力

在我国历史上，战争从来就是一代王朝之兴与一代王朝之废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手段，明清战争，尤其体现了军事斗争在改朝换代中所起的作用。自一六一八年抚顺、清河首次交锋，直至一六六二年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垮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大战、小战交替进行，战役几近千百次。这场战争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波及地域之广，为亘古所少见。明清战局的演变过程，不只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且也鲜明地展示了明清这两个政权一兴一亡的过程，不言而喻，考察明清战争对于阐明清初历史发展趋势有着特殊的意义。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根据明清战争的发展变化，分成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首次伐明，揭开了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到一六一九年萨尔浒激战，应是后金的战略防御阶段。努尔哈赤作为其代表人物，顺应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奋力统一女真各部，逐步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力量，把女真推上中国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自此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当她感到自己的力量发展到足以同明朝抗衡的时候，她再不愿顺从地接受明朝的统治，更不能容忍明朝对她实行民族压迫和剥削。努尔哈赤举兵伐明，同明决裂，也就成了合乎正义，顺理成章之事。明朝为维护君临天下的统治权，毫无疑问，它不能容许一个藩属的反叛行为。它征调九万大军，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分四路出击，欲一举荡平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于萌发之中。战争的结局，正好与它的愿望相反，它在这次激战中遭到惨败。乾隆皇帝曾评论说：后金此时“草创开基，筚路兰缕，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弗满数万”，由于“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师直为壮”，努尔哈赤以正确的战略战术为指导，赢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乾隆最后说：“由是一战，而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我大清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于此”。①

第二阶段，从一六一九年六月，到一六二六年春，在七年中，明朝处于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地位，努尔哈赤则乘胜展开战略进攻，仅用一个多月，他连续作战，下开原，破铁岭灭叶赫；又以十天的时间毕其功为一役，连夺沈阳、辽阳等名城雄镇，明在辽东的防线顷刻

瓦解，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均在辽宁省，即金县、复县、海城、盖县）等七十余座城堡“传檄而陷”②。后金快速而勇猛，连续而不停顿，攻城略地，无不如意，仅以五、六万兵力，大破三倍于已的明军总共十几万，这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开铁之役、辽沈大战，是萨尔浒激战的继续，也是它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说，萨尔浒之战决定了后金的存在，那么辽沈之战决定了后金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使后金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并依赖所取得的大片土地及其繁盛的大城市，众多的人口和巨量财富，最终发展成为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的一代王朝③。

继辽沈大战之后，一六二二年初，努尔哈赤率大军渡过辽河，夺取了广宁，一六二六年攻宁远（辽宁兴城），应该说，都是辽沈大战在军事上的影响不断扩展的结果。但是，对全局产生又一次重大影响的是宁远之役。袁崇焕坚守住宁远，阻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迫使努尔哈赤从战略进攻的高峰上跌落下来。此役不久，努尔哈赤惨败而郁结成疾，不治而死，才使明朝乘机构筑宁锦防线，双方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阶段，从一六二七年，到一六四二年松锦决战前，为明清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一方面，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累次向辽西挺进，大凌河（辽宁锦西）、锦州、宁远一带展开激战：一方面，明兵“凭坚城用大炮一策”④坚守住宁锦防线，迫使清兵长期徘徊于大小凌河之间，十余年，仅夺取了大凌河一城。但皇太极采取了大胆的战略，绕过山海关，取道内蒙，先后五次遣大军突入北京城下及其周围地区，最远深入到河北南部和山东境内，大军所至，如入无人之境，都获得了程度不同的重大成功。皇太极决策入关征明弥补了他在辽西毫无进展的损失。

第四阶段，从一六四二年松山决战到一六四四年清兵进关，是清朝发起战略总攻击的阶段。皇太极即位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努尔哈赤开创的事业迅速地推向前进，在内政、外交、军事和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地进展。他两次派遣大军降服朝鲜，铲除皮岛明军的根据地，彻底除掉后顾之忧：他几次派军远征强悍的蒙古察哈尔部，引导漠南蒙古归于清政权之下，他趁着有利的形势，于一六四〇年（崇德五年），皇太极决心打破长期的僵持局面，必欲突破宁锦防线，作出包围锦州的战略决策。锦州是宁锦防线的一个重要环节。锦州被围，震惊了明朝统治集团，惟恐锦州一破，关外诸城随破，山海关失去屏障，将置京师于危险的处境。于是，它不惜一切代价，调集十三万大军、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猛将援锦。明朝此番举动，在于同清军作孤注一掷的决战。皇太极抓住战机，“悉沈中之丁”⑤亲率倾国之师十余万人，同明军在松山展开大会战。皇太极以十日之功，大破明兵十三万，再擒其统帅洪承畴、总兵大员及将领数十人，“于是，锦州、塔山、杏山各城守，势如破竹，不数月，相继下，山海以东尽为我有”。⑥这场大战，是战略上的重大突破，从而结束了明清在辽西长期拉锯的局面，清由踏步不前，转变为战略进攻。皇太极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⑦一六四四年清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向关内，占领了北京，开创了清朝统治全国的新纪元。所以，乾隆对萨尔浒与松山两次决战作了比较后，说“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确非夸张之语。清朝一向推崇这两大战役，道理即在这里。

列宁指出，古今一切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在战时所实行的政策，必然是它们战前长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⑧努尔哈赤时期，后金还有一个奴隶制国家，奴隶主贵族不仅在本民族的

广大劳动人民中进行剥削与压迫，而且要向外发展，把明朝直接统治下的汉族人民作为掠夺对象。它通过对明的战争，不断掠夺财富和大量人口，“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⑨正如恩格斯所说：“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换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在后金，“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⑩。努尔哈赤的政治想理，“并无必成帝业之心”，不过是欲划山海关为界的后金国而已。到皇太极时，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旨在一步步踏着千百万人的尸骨登上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从明朝方面来说，它艰难地进行战争，则是为继续保持和企图恢复它的一统天下。结局是明朝节节败退，清朝如愿以偿。显然，“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策发展的方向，只是加速这一发展。”⑪

我们考察战争，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双方兵力的互相厮杀。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的，也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战争的胜负，不单单是军力，物力的对比。而且还是政治力量消长、政策得失、人心向背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否得到发挥等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清朝的一系列的胜利，表现了这个政权的巨大活力。它有一支强大而善战的八旗劲旅。同时，它争取到了蒙古的强有力的支持，还吸收了数以万计的汉兵汉官参加它的政权，从政治和经济、军事上壮大了它的实力。表面上看，这个政权是以满族统治阶级发动的战争，实际上是满蒙汉联盟对明作战，特别是它实行“以汉攻汉”的政策，用招降的大批明朝将士攻击明朝无不奏效。明末政治黑暗腐败是人人皆知的，它不仅各项政策失计，而且内部倾扎、党派纷争已注定它不能再振，只能步步退缩，抱守残局，直到全局丧尽为止。这一变化是伴随着战争的进程而演变的。明清战争的过程同明清兴亡的过程是同步发展的。明清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明清兴亡的必然趋势。

二、新的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形成

从一六一八年明清（后金）抚顺、清河首次交峰，至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共二十六年间，频繁而不间断的战争正在迅速改变明朝一统江山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以长城划分的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万里长城西至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如果加上明增修的辽东边墙，已达鸭绿江畔的镇江（辽宁丹东）。这道蜿蜒曲屈的万里长城，不过是限隔汉族与北方少数各民族的居住区域的一道藩篱，主要目的是防备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它反映了封建主义时代广大的农业区与经营畜牧的辽阔草原之间的对立。

这里，不妨先从东谈起。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逐步完成对东北全境的统一，其间，父子两人都屡次南北用兵：南自旅顺，北至黑龙江畔，直至江北以远，八旗骑兵的足迹，无所不至。我们不想具体叙述父子二代人如何用兵，乃至如何统一，这里只须引述皇太极于一六四二年（崇德七年）发布黑龙江大捷的文告，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写道：“予缵承皇考太祖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滨海(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⑫这段话宣布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他所勾画的大清朝，已辖有广大的东北及蒙古的广阔疆域。

与东北疆土有联系的是朝鲜，曾是清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两次进兵朝鲜，不但彻底切断它同明朝的一切关系，从而控制了朝鲜。

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蒙古族居地。从努尔哈赤起，就重视与蒙古的关系，极力

争取它的同盟，以对付明朝。皇太极时，抚剿并用，联合蒙古科尔沁诸部，集中力量打击同它为敌的察哈尔部，先后三次出兵远征，最终把察哈尔部撵得无立足之地，其首领林丹汗逃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子额哲率余部向皇太极投降。至此，察哈尔灭亡。皇太极三次用兵察哈尔，实际上是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战争，分裂的漠南蒙古重新获得统一，并入了后金政权的管辖之下，皇太极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录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西藏）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⑬

皇太极灭亡林丹汗，推动了漠北蒙古积极向清朝靠拢。漠北蒙古亦称喀尔喀部，分别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和车臣汗所统治。一六三六年（崇德元年）十一月，车臣汗遣使来沈阳朝贡。一六三八年（崇德三年）三月，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与车臣汗都遣使来朝。此后，他们按规定每年向清朝行"九白之贡"⑮，正式建立了臣属关系，它标志着辽阔的外蒙古也归入清朝的版图。

综上所述，可知清入关前，它与明形成新的南北对峙局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以往论者只看到在清在辽东一隅之地，忽视它领有东北及长城以北的大片疆域，因而把清的力量估计过低，以为它之入关夺权，系偶然与幸运所致，这是缺乏历史事实与分析的。

三、清进关夺权是必然之势

一六四四年，在明清兴亡史上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也是伟大的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先是李自成于三月率领农民军胜利地进入北京，明朝作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宣告灭亡；在这一年，十余万清军铁骑奔驰进关，占领北京，开辟大清历史的新天地。清与明、与大顺等政治势力奋力角逐，各种矛盾与斗争交织在一起，而胜败决于朝夕之间，且巧合于一六四四年。这种带有戏剧性的历史巨变，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六四四年堪称为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大事变的年代。

应当指出，一六四四年，明失去北京，李自成得而复失，最后为清所有。一年之中，不过四十日，变化是如此之大，可谓天翻地覆。从表面看，的确是历史偶然巧合。但是，我们能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清兴亡，包括李自成的失败，都是偶然性造成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胜负结局是否与必然性毫无关系？或者说，清之有天下得之于历史的幸运，而明亡与李自成的覆没却是历史的厄运所致？我们认为，用历史的偶然性来解释它们各自的历史命运是不妥的。因为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现象。欲得出正确结论，还必须探索内在的更深刻的原因。

恩格斯说得好："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这里所说的"规律"，亦即必然性，"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⑯简单说来，偶然孕育于必然之中，而必然是又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显然，把明清之际的历史演变完全归于偶然性，与必然性无关，这从理论上很难说得通，也不符合明清交替的历史的真实情况。

事实是，一六四四年政治格局的天翻地覆，突发于"曾几何时"之间，却是经历了长期

的酝酿过程，各种矛盾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六四四年的局面。本文的第一、二部份对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已作了较详细地说明，着重指出，清统一全国的过程，早在关外时期即已开始。努尔哈赤在辽东地区建立了前进的基地，经皇太极大力推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进程。他以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为终极的政治目标，不断发动对明的战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后经松山决战，造成了清军直捣山海关的内逼之势。在关内，又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不断消耗明朝实力，逐步逼临北京，从而与清兵不约而同地对明构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明朝的灭亡已成定局，何时灭亡，仅是时间问题。

恩格斯在阐述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时，曾说出如下一段精彩的话："在发展的过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的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⑰新的代替旧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明朝腐朽至极，是急速衰亡的东西；关外的清朝、关内的李自成等农民是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们是正在发展壮大的现实的巨大力量。它们以暴力最终战胜明朝，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关于这一点明清之际的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得明白。自称"明遗民"的何倩甫作《大明论》，他写道："（明）国坏者何也？北方州郡荒旱水灾相继而作，百姓困苦，啼饥号寒，流离琐尾，不可胜数。当此之时，臣无直奏其事，君不闻民之苦，而民不思为逆者寡矣。天祸李闯，机谋百出，散财结党，渐入畿内……突然内外合攻，顷刻破城"⑱这段评论，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有的甚至说："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⑲这就是说，明必亡，在当时已成定论。同样，清朝与李自成当兴，也是必然，至于它们三者何时互相"代替"，以何种方式及怎样"代替"，则表现为偶然性。这里，偶然性不正是必然性的生动反映吗？例如，李自成率领农民大军捷足先登，攻占北京，易明而替代。明没有直接亡于清朝，而亡于农民军之手，确属偶然。但这偶然性完全体现了明朝之亡的必然性。清朝长期同明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当李自成破北京的消息传来，它马上意识到，它同明争夺天下已失去实际意义，摆在面前的最主要的对手是李自成的农民军。位居显要的汉官范文程在参与决策进关时，明确指出："明之劲敌，我国与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⑳清朝能否"统一区夏"，关键是与农民军的最后较量。因此农民军成了清朝的"必讨"的目标㉑，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清朝与农民军，究竟谁战胜谁？开始，人们很难予料。因为从实力对比来看，基本势均力敌，但农民军在总的数量上已占有优势。它经过长期的作战，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也并不比八旗劲旅逊色。但结局是，清朝胜利了，李自成失败了。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习惯看法，认为吴三桂开关迎降，对清兵入关，统一全国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李自成本应最有资格建立新王朝，却因麻痹轻敌遭到了完全失败，但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实际上，清朝与李自成农民军的不同结局，各有其深刻的内在因素。

首先，清兵进关夺权，是清建国后主要是皇太极定下的基本国策。它同吴三桂开关迎降毫无必然性联系。皇太极在位十七年，他为未来进关夺权做了充分的准备，一直耐心等待条件的成熟和机会的到来。李自成先破北京，这就为清朝争雄中原消除了一大障碍，并提供了最后夺权的千载难逢的一大机会，清朝立即抓住不放。范文程说得非常肯定：建立帝业者，在"此时"，失去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㉒，正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急切心情。事

实表明，清兵迟早要进关，势在必行，这是毫无疑义的。其次，清兵无论从素质、装备、物资供应及作战经验等一切方面，都具备了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当摄政王多尔衮最后决策进关夺权，尚不知吴三桂要降，他们仍打算抛开山海关，从故道即经内蒙古地区进关，或直取北京，或攻取要地，在山海关以西地方，择一坚城顿兵，作为清兵出入的门户[23]。这是可行的一个稳妥计划。大军出发后，于行军途中，在翁后地方（辽宁北镇附近）突然接到吴三桂"请兵"的降书，才改道直趋山海关。吴三桂投降，他的作用是使清军避免长途跋涉，少走弯路，大大缩短了清军进关的时间，使胜利提前来到。再次，吴三桂之降清，事出突然，决于急促之中。实在说，他本无意降清。当李自成给予优厚条件时，他决定投向农民军，并且真的率师返京，接受李自成的改编。但行至半路，听说家被抄，父亲被囚、宠妾陈圆圆被虏，便改变了主意，返回山海关，在得到李自成亲自率军攻山海关的消息后，他惊徨无法自存，终于急促定策，投向清朝一边，事实表明，吴三桂降清是一个偶然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清兵非请自来，它与吴三桂的"请兵"纯属偶然巧遇。但是，这个偶然事件却真实地反映了清军迟早进关的必然性。任何夸大吴三桂作用的说法，都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清军与农民军在山海关一仗，就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未免令人为李自成婉惜，为清朝感到幸运。其实，就其实力而言，李自成在山海关损失人马不过几万，尚有数十万大军屯于北京内外。虽然麻痹轻敌，招致失败，但一次失败也不致导致最后覆灭的惨局？例如，明朝同清兵作战达二十五年之久，失败何止几十次，上百次，还没有亡国。而李自成败过山海关一次将变得不可收拾，迅速没落。原因正如皇太极生前所说：明立国很久，制度详备，基础牢固，能经受住各种不测事件反复的袭击[24]。李自成农民军则先天不足，且不说他立国多么短暂，就说他没有一套建立新政权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单纯军事观点，得一地，即弃一地，得一城即弃一城，得了北京，却把已攻得的城镇地盘差不多都交给明降吏看守。李自成进了北京，应当筹划如何迅速建立新政权，颁布制度，巩固已得胜利成果，吸引广大群众和各阶层及知识分子对该政权的支持。相反，却把几十万大军开进了北京城。开始，纪律尚可维持，但很快败坏得无法约束。加之他们的错误政策，把北京搞得混乱不堪，人心惶惶，大失人望。后金谋臣范文程就予见到李自成必败。第一，"逼殒其主，天怒矣"。第二，"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第三，"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25]事实正是这样：李自成率精锐来战山海关，是存在着胜利的可能性的。但他们身怀"重宝"钱财，还怎能舍命死战？李自成在攻陷北京前就与诸将帅"约分京师财物：内藏归自成，勋戚归刘、李诸贼帅，文臣归牛、宋诸臣，富户归小盗。京师得，约封诸臣为公侯伯、锦衣卫所诸官，厚加赏赉"。在李自成率精锐出征山海关，经通州时，"大驱马骡三千、橐驼一千，驮载辎重归陕。"[26]李自成曾说："陕，我父母国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岂易一西安乎？[27]这表明，李自成并无久居北京的打算。因此一旦发现清兵入关参战，顿时失去信心，溃败不止。李自成败归北京后，很快撤离西走。李自成进如流，退亦如流，没有自己可立足的巩固根据地，他怎能敌得过组织严密的八旗劲旅呢！全面考察李自成进北京后所作所为，不象一个创业之君。这与努尔哈赤、皇太极形成鲜明对照。他们两代人稳扎稳打，特别注意制度与政权建设，真正是在创业，而不是目光短浅地贪图一时利益，他们以辽东为根据地，进可战，退可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两相对比。我们就不会怀疑李自成失败是必然的，无可挽回的，他只能让位给雄心勃勃的清朝。换句话说，正是李自成的错误政策为清朝的成功准备了条件。（下转64页）

玉楼赴召在玄羊—曹雪芹卒年问题浅识　薛瑞生　西北大学学报　1985：2
乾隆与纪昀　躬　运　人物　1985：2
略谈和珅出身、旗籍问题　冯佐哲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5：2
阿·托尔布津死亡日期考释　李泳炎　清史研究通讯　1985：2
论姚门四杰　黄　霖　江淮论坛　1985：2
“姚门四弟子”考　林　岗　文学遗产　1985：2
靳辅治河简论　宋德宣　社会科学（甘肃）　1985：2
关心水利的湖广总督—汪志伊　曹健民　中国水利　1985：2
清代政治家和爱国者王鼎　常宗虎　历史知识　1985：2
舒尔哈齐死因新探　冯年臻　社会科学辑刊　1985：3
论袁崇焕的民族思想　何溥滢　感肇华　民族研究　1985：3
“横戈原不为封侯”：袁崇焕抵抗后金　范兆琪　中国历史（苏州大学）　1985：3
论康熙的人才思想　宋德宣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5：3
满族旅行家图理琛　唐锡仁　地理知识　1985：3
清代三位新疆大臣　戴良佐　历史知识　1985：3
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　李治亭　光明日报　1985·4·3
论方苞的思想　王镇远　江淮论坛　1985··5
熊廷弼死因新探　马舍乡　江汉论坛　1985：6
档案为袁崇焕洗冤　大可　档案工作　1985：6
牛金星有没有降清　金　封　解放日报　1985·6·5
康熙皇帝的治水实践　周魁一　中国水利　1985：6

六、其他

一九八四年清史研究回顾　薛瑞录　清史研究通讯　1985：1
台湾清史研究一瞥（续二）　戎　笙　清史研究过讯　1985：1
台湾清史研究一瞥（续三）　戎　笙　清史研究通讯　1985：2
论清史分期问题　许曾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5：2
一九八四年清史研究概况　郭　疆　中国史研究动态　1985：6　**（吴永兴、吴玉清整理）**

（上接12页）

①《太祖皇帝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
②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③孙文良：《论辽沈大战》，辽宁大学《学术论文选编》。
④《明史》卷269，《袁崇焕传》。
⑤《沈馆日录》
⑥乾隆：《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战书文》。
⑦⑫⑬㉔《清太宗实录》卷62,61,20,37。
⑧《列宁选集》卷24，第369页。
⑨昭梿：《啸亭杂录》卷2，《汉军初制》。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第160页。
⑪《列宁全集》卷22，第517页。
⑭王先谦《东华录》天聪10年2月。
⑮福格：《听雨丛谈》卷2。
⑯⑰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⑱《华夷变态》卷1，第111页。
⑲《崇祯长编》明亡述略·序。
⑳㉕《清史稿》卷232，《范文程传》。
㉑㉒㉓《碑传集》卷4，《范文程传》。
㉖《流寇志》卷12，第136页。
㉗《平寇志》卷10。